

《边区群众报》： 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

□ 任 敏

《边区群众报》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一份重要报纸。《边区群众报》起初由大众读物社主办，后为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，1941年5月13日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。在近8年办报过程中，《边区群众报》坚持服务群众、贴近群众，在教育人民群众提高觉悟，加强各项建设，保卫边区，支援抗日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成为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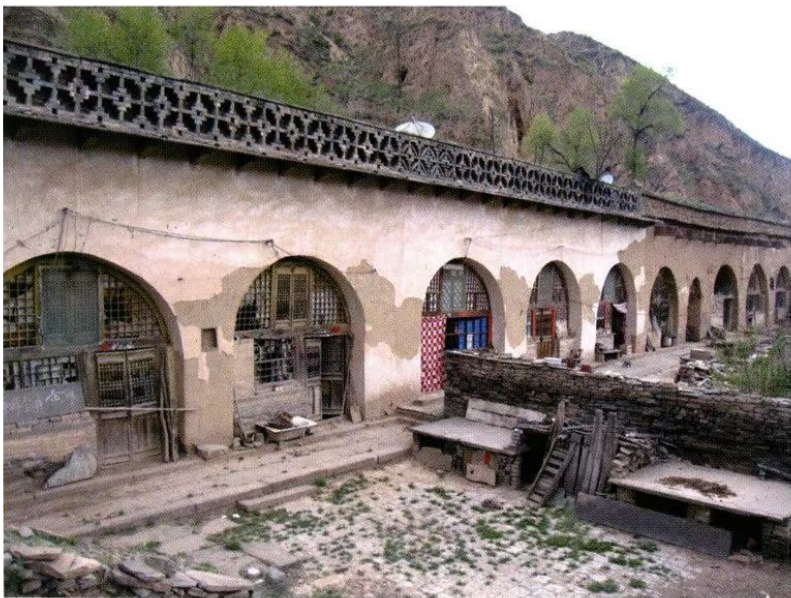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群众办报

1939年底，毛泽东与刚从重庆来到延安的“左联”著名作家周文谈话，鼓励他针对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，编辑出版一张适合边区群众需要的大众化报纸。周文接受了创办大众化报纸的任务，并在边区党委和中央宣传部的协助下，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。1940年3月12日，大众读物社正式成立，周文任社长，下设报纸科，负责编辑《边区群众报》。3月25日，《边区群众报》在延安正式出刊。《边区群众报》的报名为毛泽东建议定名，也为他亲笔题写。

《边区群众报》瞄准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，以宣传内容短小精悍、通俗易懂为目标，致力于创建边区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。在版面设计上，采用“大标题+大字号+短文章”的排版设计，开设“科学常识”“农民的经验”“群众来信”“工农写作”“百宝箱”等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栏目，让群众更加快速地从获取实用信息。在报道内容上，在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，结合陕甘宁边区的地域特点，紧密围绕边区群众生产、生活等方面的需求，把农业生产情况、生活常识、农业型经济、医疗卫生等题材作为重要内容。在语言表达上，注重行文口语化，较多使用边区群众熟悉的方言土语，“蓝格幽幽”“红格艳艳”“解下解不下”“赶黑”“刁空”等富有陕北乡土气息的词汇经常出现在报纸上，使读者倍感亲切，无形之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。在表达形式上，借用民歌、说书、顺口溜、谜语、图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形式传递内容，做到既简短活泼又易读易懂易听，彰显“群众报”的风格特色，受到了广大边区群众的欢迎。

依靠群众办报

《边区群众报》在办报过程中始



《边区群众报》编辑部旧址



《边区群众报》

终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力量，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成功走出了一条“大家办，大家看”的“群众办报”道路。

指导基层干部和群众完成工作、生产任务。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《边区群众报》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它尽可能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进行宣传，如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》、毛泽东的《组织起来》等，都是经过改编后用农村群众能听懂、能理解的语言刊发出来，能够更好地起到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的作用，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。

以群众为报道主体。《边区群众报》坚持从身边人、身边故事入手，把革命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、奋斗的场景以及一些典型人物和感人事迹作为报道的重点。比如，以模范党员刘玉厚、劳动英雄申长林为代表的劳模群体成为《边区群众报》新闻报道的主角。同时非常关注农村妇女问题，刊登了大量妇女人物的报道，郭风英、折碧莲、张桂花等一批勤劳勇敢的劳动妇女出现在大众视野，呈现了陕甘宁边区劳动妇女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、挣脱封建旧束缚、政治地位和家庭地位逐渐提高的生动图景。

聚焦群众关心的问题。《边区群众报》立足陕甘宁边区实际，秉承“说出边区群众要说的话，讲出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”原则，专门开辟“群众的话”专栏，鼓励读者给报纸写稿写信，以期真正反映出边区人民的意见与呼声。《边区群众报》从读者来信中选择刊发了很多边区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，还请专门人员解答，或发动读者讨论，确保每一封来信来稿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，为读者和编

者直接交流提供了渠道。同时也很重视给读者写回信，这样不仅增进了报纸与读者间的感情，也让报纸能时时了解读者的所需所求。

邀请群众参与办报。为了做到每一篇稿子“念着顺口，听着顺耳”，报社编辑记者常常带上编写的稿子，请社外人员进行“审稿”。即每期稿子编好以后，除了召集报社全体人员一起来参与审查修改，还会邀请文化水平不高的“大师傅”（炊事员）“小鬼”（勤务员）参与其中。审稿的大致程序是：先读完稿子，再征求大家对稿子内容的看法，如果有什么大的意见和问题，再重新写；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建议，就逐个读一遍。每读一段，就请大家谈谈对这段话的结构、句法和措辞的看法，尽量使之准确、通俗易懂。

办报效果由群众评判

《边区群众报》一出版就立即受到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。先是十日刊，很快改为七日刊、五日刊。创刊时是一张石印四开两版的旬刊，后来各地纷纷要求增加份数，而且要求报纸扩大版面，充实内容。因此，《边区群众报》出了10期以后，就改为铅印四开四版的周刊，每期报纸由4000多字增加到八九千字。在当时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陕甘宁边区，只有150多万人口，《边区群众报》的发行量高达一万多份，可以说是一个奇迹。这份报纸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了根。为表达对这份报纸的喜悦之情，边区民众还为“群众报”编了一首歌：“有个好朋友，没脚会走路；七日来一次，来了

不停口；说东又道西，肚里样样有；交上这朋友，走在人前头。”

《边区群众报》也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和边区领导人的称赞。1940年10月，毛泽东专门致信给社长周文，指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办得非常成功，报社的工作是意义有成绩的。在《边区群众报》创刊一周年之际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询问毛泽东最喜欢读什么报，毛泽东直言：是《边区群众报》。1946年4月，在《边区群众报》创刊6周年之际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贺信中指出，“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，谁也喜欢它，谁也爱护它，为什么好？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，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，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。这就是为群众服务，当得起‘群众报’这个光荣的称号”。

1947年10月，《边区群众报》随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迁址绥德县。1948年1月10日，《边区群众报》改名为《群众日报》。1949年5月，西安解放。报社成员先后进驻西安，并于5月27日出版西安版《群众日报》，成为《陕西日报》的前身。《边区群众报》自创办起，在近8年时间里，向边区群众和干部传达团结抗战、生产建设的任务，而且教边区群众和干部怎样来工作、来动员、来生产、来完成这些任务，对边区人民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指导作用，对巩固边区、战胜敌人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

在乡间，最省心的稼穡，莫过于种南瓜！

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。”毛毛细雨里，在菜园一角刨个坑，填入地地道道的农家有机肥，将雀舌似的南瓜籽种下，掩上土壤，就尽可以忙别的事了。

南瓜籽发芽了，拱出地面，变成了南瓜秧。风儿梳，雨儿润，它开始长藤了，宛如一条调皮的青蛇，四处游走。悄悄地，从小绿伞似的叶子间，绽开金喇叭似的花儿。花香，引来了蝴蝶、蜜蜂、蜻蜓，菜园一片繁闹。

花谢了，结出葡萄大小的嫩瓜，不久长成杏子大小的青瓜。进入夏天，伴随生长速度的加快，瓜儿开始成形，有的像纺锤，有的像牛腿，有的像磨盘。菜园静悄悄的。瓜色次第而变，青色、墨绿、黄褐、金黄，到了金秋时节，定格为金红，喜气又养眼。

一只只瓜，是那么的饱满、圆润、憨实，让人忍不住上前摸一把，白生生的霜粉，触在指尖，温润滑腻，惹得人心儿跳跳的。

该采摘南瓜啦！

“咔嚓——！”从瓜蒂处，将藤剪断，好家伙，断口清汁直冒，哟哟！用力将它抱起，宛如一个胖小子，真沉呀。实在抱不起，就推着它滚动，将它送上板车。不一会儿，车上南瓜垒起，俨如一座小金山。

家乡民谣云：“一囤南瓜，可抵半年粮。”南瓜丰收后，运回粮仓，得将它好好囤起来。乡间旧年，南瓜可度饥荒。记得有一年，家乡发生水灾，田地都淹了，粮食歉收，幸亏山坡上的南瓜存活下来，解决了青黄不接的困难。

南瓜真是个好宝，炒炸煎煮，蒸炖煨烤，吃法可谓七十二变。在乡间，女人们皆是做南瓜佳肴的高手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最好吃的，莫过于母亲做的南瓜饼、南瓜粉蒸肉。

吃南瓜饼，一般在中秋佳节。

“嚓——！”一刀下去，南瓜裂开，露出粉灿灿的瓜瓤，将之掏尽，留下白生生的瓜籽；然后，将杏黄色的瓜肉切块，上蒸笼，大火蒸熟；待凉后，混合糯米粉，揉匀成团；随后，撒荆子，填入豆沙、莲蓉、红糖、板油，拍成饼状；接下来，将锅烧热，滴入香油，将饼沾上芝麻，下锅，文火慢焙。

当一面变焦黄后，再焙另一面，就闻到南瓜饼的香气了。中秋之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咬一口南瓜饼，感觉此饼外脆内酥，甜糯爽口，回味绵长，令人齿颊留香，味

南瓜可亲

□ 刘峰

道堪比月饼。

最幸福的事，是过年吃南瓜粉蒸肉！

南瓜贮藏久了，成了老南瓜，味道更甜。将南瓜切成块，添加五花肉，拌入糯米粉，调入五香粉、食盐、米醋，上蒸笼大火而蒸。蒸的时间一长，连袅袅炊烟都是香的，掀开蒸笼，只见油汪汪一片，灿若朝霞，撩人的香气，惹得我口水直流。

年夜饭，此菜最受欢迎。瓜香肉香互相渗透，五花肉肥而不腻，南瓜甜糯可口，全家人一边大快朵颐，一边啧啧称赞。

该守岁了！

家人团坐，亲情满满。噙着母亲亲手炒制的南瓜子，静听时针在墙上滴答，再瞧院里仓房中的半囤南瓜，感觉走过的这一年，丰收的南瓜是最好的见证！

至今犹记，大雪天，孩子们四处疯狂，捉迷藏时分，我躲在一处荒坡，无意间瞥见一大团橘红色之物。悄悄摸过去一瞧，原来是南瓜，它竟偷偷地生长在蒿草丛中。那一刻，我仿佛捡到了一个“金元宝”，开心得要飞起来。

多年后，吃南瓜饭长大的我，离开了故乡，开始了四处的漂泊。在渐行渐远中，故乡发生了沧桑巨变，留给我的是一抹多彩的背影，那是碧绿的藤蔓、灿烂的花朵、金红的硕果——南瓜里，藏着一个故乡！



《学记》是儒家经典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是中国古代最早论述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。郑玄称其“记人学教之义”，朱子则谓其“言古者学校教人传道授受之次序，与其得失兴废之所由”。这一篇1200余字的文献，阐述了先秦时期的教育经验和教育实践，蕴含着丰富的兴教兴学之道。

尊师重道是兴教之源。“师道尊严”最早见于《学记》，本义是“尊师重道”。《学记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凡学之道，严师为难。师严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民知敬学。”东汉郑玄注：“严，尊敬也。”那么，这段论述就可以理解为：为学之道，以尊敬老师最难做到。老师受到尊敬，道才会受到尊重，道受到尊重，民众才能懂得敬重学业。《学记》把师者的地位看得至高无上，其曰：“能为师然后能为长；能为长然后能为君。故师者也，所以学为君也。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。”意思是，能做老师，然后才能做官长；能做官长，然后才能做君王。所以，学为人师就是学为人君，因此，选择老师不可以不慎重。在中国古代礼制中，一般是君尊臣卑，但《学记》中强调君王也要注重“师道尊严”，“大学之礼，虽诏于天子无北面，所以尊师也。”意思是，若君主到学校向老师

请教，则不以臣子相待，以表示尊师重道。尊师重道的主张为师者确立了尊崇的地位，也为兴教兴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

为人师表是立教之本。《学记》中言：“善歌者使人继其声，善教者使人继其志。”意思是说，善于唱歌的人，会使人不由自主跟着他歌唱；善于教育的人，会使人由衷地跟随他的志趣。老师擅长什么，学生就会模仿学习什么，因此，师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品德和才能，才会令人信服，成为学生学习和效仿的榜样。《学记》中阐释的为师之德，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。一是要有广博的知识。“记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，必也其听语乎”，只靠现学现教，照本宣科，背诵现成的答案，是没有资格给别人当老师的。做称职的老师，要针对学生的提问进行讲解，为学生解惑，必须有足

够的知识基础。二是要胸怀仁爱之心。《学记》中讲，“学者有四失，教者必知之。人之学也，或失则多，或失则寡，或失则易，或失则止。此四者，心之莫同也。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。教也者，长善而救其失者也。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误，或不求甚解，或孤陋寡闻，或缺乏专注，或故步自封，心态各不相同。所以，为人师者必须有仁爱之心，能够积极地体察不同学生的心理、性情和能力，尊重差异、耐心引导，鼓励学生扬其所长、避其所短，才能做到“长善救失”。三是要擅长语言表达。“其言也，约而不烦，微而臧，罕譬而喻”。意思是说，老师的语言要简明而透彻、精微而妙善，举例不多但却表意明白。这三部分概括了老师必备的专业素养和道德品行。

方法得当是施教之要。《学记》中

论述了“教之所由兴”和“教之所由废”的道理，提出了一系列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。其一，教学相长的教育原则。《学记》指出：“是故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。知不足，然后能自反也；知困，然后能自强也。故曰：教学相长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学习之后才明白自己的不足，教人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困惑。明白不足，才能反省自己；发现困惑，才能自我勉励。体现了教与学之间互相促进、相辅相成的作用。其二，启发引导的教育理念。继承了孔子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的教育思想，《学记》中提出“君子之教喻也，道而弗牵，强而弗抑，开而弗达。道而弗牵则和，强而弗抑则易，开而弗达则思”，就是说，在从教过程中，要通过引导来使学生知晓方向，注重鼓励、启发学生独立思考，而不是直接示以结论。其三，循

□ 王秋爽

《学记》中的兴教之道

时教必有正业，退息必有居学。不学操缦，不能安弦；不学博依，不能安诗；不学杂服，不能安礼；不兴其艺，不能乐学。”正业指的是课内学习，居学指的是课外活动，不在课外活动中中学好操缦、博依、杂服之类的杂艺，就不能更好地学习礼乐正典，这也正是孔子“游于艺”的精神所在。因此，《学记》中总结道：“故君子之于学也，藏焉，修焉，息焉，游焉。”藏指入学受业，息指退而私居，入学受业有所修，休息居学有所游，课内外结合，张弛有度，教学活动摆脱了单一刻板的模式。

《学记》被认为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最经典的文献之一，清代学者陈澧在《东塾读书记》中评价道，“若以此为法，学术由此而盛，人才由此而生矣”。《学记》中论述的教育原则和方法，以及对于师德内涵的深刻思考，凝结着古代先贤的智慧结晶，为后世办学施教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。

